

英国研究简报

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 指导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 主办

2013年第9期
总第9期

本期要目

英国涉华报道 2

- ◎ GSK 深陷“行贿门”，中国政府将严厉制裁
- ◎ 经济转型：基本面分析
- ◎ 网络反腐：鼠标比纸笔更有力
- ◎ 英国媒体有关“中国梦”的舆情动态

英国社会文化动态 13

- ◎看得见的公正——摄像机离法庭还有多远？
- ◎当童年遭遇手机
- ◎伦敦城区的中产阶级化
- ◎新王子降生，登基仍尚需时日
- ◎爱德华·米利班德与工党的未来
- ◎不堪推敲的“青年合同”
- ◎“试管”牛肉——未来之肉
- ◎英国小王子的影响力
- ◎英国将对移民征收医保税
- ◎英国人对外来移民不满加剧
- ◎英国外相声明联合国深入调查叙利亚化学武器问题
- ◎英国人消费倾向选择折扣店

重点报道 34

- ◎你在笑什么？
- ◎日益严厉的英国反污染性交通政策

深度评论 40

- ◎卡梅伦施压谷歌屏蔽色情信息 ◎卡梅伦：政治家还是父亲？
- ◎如何继承撒切尔夫人的遗产

GSK 深陷“行贿门”，中国政府将严厉制裁

近日，中国政府曝光了英国制药巨头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GSK）的巨大行贿丑闻和严重经济犯罪行为。



一个月前，贵州一位女士在丈夫的陪同下来到医院看病，在做完一系列妇科常规检查后，医生给她开了近 200 元的中药（其中一些药还含有问题成分），夫妻俩虽不乐意，提出了异议，但是在医生的一再坚持下，他们最终还是掏了钱。

事后，这位女士的丈夫在搜狐上发了一条微博：“当时有很多人排队在等着看病，医生趁机向我的妻子施压，让她最好别再拗了”。此微博一经发布便掀起了轩然大波，网友们纷纷进行评论，很多人都觉得他是被医生坑骗了。其中一人写道：“现在中国绝大多数的医生就如同贪官污吏一样道貌岸然，不知廉耻。”

而最近，在公安部门的调查下，GSK 的主管们承认他们六年来通过七百家旅行社和咨询公司贿赂中国医生及官员的犯罪事实。仔细想来，那名贵州市民的遭遇充分说明了中国现行医疗保障体制下此类渎职、违法行为存在的普遍性。

医院虽然表面上有政府的财政支持，但其实资金匮乏。因此，医院必须依赖药品的销售来维持运营，而医生得多开药才能补贴自己不高的工资。最后，医生开出的高昂药品都得由患者买单，其中不乏一些完全不必要的药，患者们就这样白白花了冤枉钱。

GSK 行贿丑闻的影响不断升级。中国政府现已拘留四名 GSK 高管，并禁止负责在中国融资的副总裁 Steve Nechelpu 离开中国。与此同时，GSK 英国总部也已派出了三名最高执行官来中国处理此事，其中就有专门负责新兴市场的最高

执行官。

中国政府监管部门对多家跨国制药企业展开了调查，发现 GSK 并不是个案。六月，在开展药品定价问题调查时，以美国为后盾的默克公司（Merck）及日本的诺华公（Novartis）就位列其中。七月十八日，又调查了比利时优时比制药公司（UCB）。

但是分析人士指出，这些跨国制药公司始终坚持国际药品质量标准，他们的违法行为其实远没有中国本国制药企业来得猖狂。北京一位研究药品诈骗的专家 Stanley Li 说：“实际上，GSK 和辉瑞（Pfizer）等跨国企业在中国市场中做得很好。相比之下，中国的制药企业做得要差得多，他们甚至不通过旅行社，而是直接给医生现金回扣，这就是警察找不到他们行贿证据的原因。凭什么他们没有得到制裁和惩罚呢？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政府需要本国制药企业的投资及税收，因此政府在包庇企业。”

七月十七日，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宣布将进行为期六个月的医疗保健体制大清理运动，旨在加强对制药业的监管及遏制非法的网上药物销售。一名评论员在《人民日报》中尖锐地指出：“对跨国制药企业的商业贿赂行为进行严厉制裁，对于维持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有着深远的意义。”

一些专家则质疑此次制裁背后真正的目的是否真的如此崇高，竟上升到了维持市场经济秩序的高度。研究中国医疗保障制度的一位西方专家指出，真正的原因可能是，中国医疗保障部门的官员认为 GSK 在向中国出口药品时人为抬高价格，态度过于傲慢。另外，一位为免遭制药公司报复而要求匿名的专家则认为，中国政府的制裁行为，实际上可以理解为：他们是在要求以正当合理的价格进口药品。因为药品尤其是治疗肿瘤的药品，其成本价与实际销售价相差悬殊，中间的差价、利润巨大。

这些年来，中国政府投入重金发展和调整医疗保障产业，共计投入了 3500 亿美元。从某些指标来看，巨大的医疗保障投入确实取得了较大的成效。比如，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这十多年间，中国人均寿命不断提高，而婴儿死亡率也已经减半；大约 95% 的中国人获得了一定的医疗保险，报销额度也从 2003 年的 30% 不断攀升。

但是医疗保障条件的改善并未根除贪污腐败，反而出现了新的问题。比如说，

政府提供的医疗保险是有上限的，一旦患者的医疗费用超过了这个上限，就得自个儿掏钱看病了。

中国政府当然有理由担心后院着火。官方数据显示，仅 2010 年一年，就有超过 17000 起针对医院员工的纠纷事件，其中很多都是由于患者对医生及治疗不满引起的。2006 年，四川省一名 3 岁的男童误食农药，火速送往医院后，医生竟然以其父母赶来时身上没带钱为由而拒绝治疗，导致这名男孩死亡。事后，约有 2000 人来到该医院门口游行示威。

一些分析人士说，对贪污腐败进行周期性的制裁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对于清理、调整整个中国医疗保障体制而言只是杯水车薪。6 年前，中国政府曾判处一名收受贿赂而让假药通过药检的药品监管人员死刑。而 6 年后的 GSK 事件，中国政府在做法上似乎也没什么改变。

一位就读于中国顶尖医药大学肿瘤学专业的博士生匿名指出，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非常迅速，一切都在日新月异地变化着。而当一些事物发展得过快时，比如医药贿赂，我们姑且就说它们像肿瘤，那么，发现这样的肿瘤你该怎么办？很简单，切除它。”

但试问，在中国，贪污腐败又该如何根除呢？

（编译：蒋怡颖）

经济转型：基本面分析

官方数据可能大大低估了中国的消费量



在香港机场，一对夫妻正在激烈地讨论是否要买一件 350 美元的 Hugo Boss 的衬衫。像在香港许多奢侈品店内一样，这些人说的是中国大陆的普通话，而非香港当地的粤语。

这机场中，有三分之一的旅客来自中国大陆，并且在机场疯狂购物的人也多数说着普通话。

据投行摩根士丹利的经济学家乔纳森·戈纳 (Jonathan Garner) 和乔虹 (Helen Qiao) 作出的一项分析显示：2012 年，中国人仅在国内旅游上的支出就达 2.3 万亿人民币（合 3700 亿美元）。然而，他们称，中国官方的 GDP 数据在统计时只计入了旅游支出的一小部分，并且还忽略了在金融服务、医疗服务以及住房方面的支出。因此，官方数据中个人消费占总 GDP 的比重便被压缩到了 35%。相反，摩根士丹利的“基本面分析”却指出，中国个人消费占 GDP 的比重自 2008 年来持续增长，现在已增至 46%（见上表）。戈纳和乔虹利用公司报表和行业研究报告，填补了官方统计的差漏，他们称，官方统计数据将中国 2012 年的消费总量低估了 1.6 万亿——超过了澳大利亚整整一年的 GDP。与之对应，早先的研究也曾表明官方统计数据低估了消费总量，尽管其差额要比前者所估计的要小得多。



两位还说，境外消费和网络消费同样也都被低估了。去年 11 月，为庆祝双十一光棍节，（电商巨头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和天猫两大网站推出了促销活动。在短短一个周末的时间里，中国消费者就在这两个网站上花去了超过 30 亿美元。但官方统计数字却没能跟上消费者的脚步，完全忽略了网络消费的巨额数字，乔虹说道。比如，网

络游戏消费就被几乎忽略，而在对网络游戏商的财务报表进行分析后，摩根士丹利估计，仅去年一年的网游消费总额就达到了 530 亿人民币（合 85 亿美元）。

中国官方统计数据向来饱受质疑。不少经济学家担心其统计数字并未反映真实情况，有些人则认为统计数据沦为了政治诉求的奴隶。2002 年匹兹堡大学的托马斯·劳斯基 (Thomas Rawski) 还抱怨（这些数据简直）是在瞒天过海。五年后，普林斯顿大学的卡尔斯登·霍尔兹 (Carsten Holz) 警告说中国的统计数据“不

可轻信”。同年，当现任中国总理李克强担任辽宁省委书记时，他曾亲口说该省的产值数据是“人造的”而且“仅供参考”。

但情况并非想象中那么糟糕。比如，中国的国家统计局（NBS）便早已不用以各省产值数据来计算全国 GDP 的做法。2004 年开展的全国经济普查更是为后续的统计工作提供了更好的基础。2006 年，经合组织出版的一本书断言中国财务数据难免“有所错漏”，因为统计人员被迫在一堆真假难辨的数据中遴选出较可信的对象进行统计，但好在他们并没有被政治操控

然而，国家统计局的做法并未让外界的独立观察者在审校时轻松多少。相反，怀疑者们开始寻找中国经济增长数据与其他数据——如发电量、水泥产量等——之间的错位。李克强曾借铁路货运量、贷款发放量和耗电量来一窥辽宁省经济的实际情况

受此启发，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的三名经济学家也用三项类似指标重估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指数（该指数是本杂志于 2010 年 12 月提出的“克强指数”的升级版）。出人意料的是，他们重估的中国的增长指数与“克强指数”相差无几。

然而，并非每一项扭曲的数据都美化了中国。实际上，其中一些数据上重大的瑕疵反而将中国置于尴尬的政治处境。例如，名古屋大学的薛进军和中国社科院的高文书便称，对于政治上高度敏感的城乡收入差距数据，官方统计数据至少夸大了 40%。

与此同时，低估的消费总量给中国的经济评论员们以抨击之机——他们担心中国的经济增长过分依赖不持续的投资，并对政府在经济转型上的失败悲痛不已。但戈纳和乔红的研究却表明，转型已经颇有进展。在对不断增长的消费总量进行估算后，他们认为官方的 GDP 还遗漏了其他消费量。如果真如此，那么中国消费总量占 GDP 的比重可能还要高于 46%。

当然，并非每个人都怀疑中国消费者的购买力。在香港机场，尽管受到香港当局的反对，仍有许多广告吸引着大陆消费者们前来抢购某种特定产品——自 3 月 1 日以来，任何试图携带 2 罐以上奶粉出境的人都将面临两年的有期徒刑。该禁令考虑到之前因对大陆奶粉安全的不信任，大陆游客将香港奶粉抢购一空的时间，旨在让香港本地的母亲们有奶粉可买。看来，打压消费的，不仅仅是中国的官方数据。

来源：

<http://www.economist.com/news/china/21574503-consumption-china-may-be-much-higher-official-statistics-suggest-bottoms-up>

网络反腐：鼠标比纸笔更有力

2013年4月11日，《英国卫报》刊载了由 Brice Pedroletti 撰写的反映中国网络反腐形势的报道，主要采访对象为近日活跃于网络上的“表哥”爆料人周禄宝及其他一些因揭露官员腐败内幕而遭到打压的网络调查员。该篇报道从外部视角较为客观地审视了中国的反腐现状。

习近平上任后不久曾宣称，他目前最为关切的是“在人民大众的监督之下”打击腐败的进程。无论是被称为“老虎”的权贵派领导人还是被称为“苍蝇”的下层干部都不能例外。而带领这一反腐行动的中坚力量则是遍布社会各行的公民记者。他们追踪腐败行为并在互联网和微博上予以曝光。

28岁的周禄宝是中国某沿海城市的家用电器销售代表，同时也是公民记者中的活跃分子。2012年夏他开始持续关注甘肃省兰州市市长，并通过网络搜索发现，在有其出现的官方图片中这位市长至少佩戴过五块不同的奢侈表。周禄宝于是将这一发现通过某种技术发布在微博和其他在线论坛上，而就在不久前他也利用了同样的技术成功致使陕西省某官员落马。“表哥”丑闻很快被媒体捕捉并大肆报道，中国的官方新闻机构新华社甚至发文称“中国的网络反腐已臻至狂热”。

与此同时周禄宝还收集到了这位官员其他腐败行为的信息，包括担任某大学主任时贷给该校一名女学生巨额公款，以及在兰州市开发项目中将合同批给其妻名下的建设工程。然而尽管社会上呼声强烈，有关部门却无动于衷。今年2月份周禄宝亲自向甘肃省人民检察院递交了请愿书，却遭到检察院的警告并险些被拘捕，随后逃往邻省青海西宁市。春节期间他又因为发表针对某前中央官员的言论导致微博账号被封，此后网上盛传他已被送去接受“劳动教养”。

2月22日周禄宝再次现身，表示将在兰州继续调查下去。他在一次电话采访中说：“鉴于目前网络动员的力量，我认为他们不敢抓我。他们要抓我就必须

证明我有犯罪行为，但我所有的行为都是面向公众的，躲在暗处的是他们。但谁知道呢，也许打完这个电话我就会被带走”。他还补充道：“我们年轻人进行反腐斗争，同时也是在主张自身权利，告诉世人我们的社会仍有希望”。

同样怀揣这种信念的还有另一位反腐斗士——43岁的朱瑞峰。他建立了人民监督网，一直从事反腐工作且“战绩”颇丰。2012年秋的“重庆不雅视频”一案使朱瑞峰声名鹊起。此案涉及重庆市某区委书记雷政富的性丑闻，朱瑞峰通过多方途径获取到有关视频，最终导致雷政富及当地其他数名干部被免职。

然而问题在于，中国的新领导人是否能够信守诺言，这种平民论的萌芽又是否会和以往一样在普遍的压制中夭折呢？

“文明社会和知识阶层需要一场有意义的改革，而不仅仅是一点改良”。律师滕彪这样解释。“改变不会来自最高领导层，因为他们不愿放弃既得利益和手中大权。只有来自公民社会的压力才会督促他们求变”。作为中国公民社会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滕彪在2011年曾入狱并遭到拷问。

网络调查员并没有因为这些外部压力而停止工作。记者高勤荣在揭露了山西运城某官员及其家庭的违规行为后表示：“有时我很想知道他们会如何把我处理掉，也许是一场车祸或者一次谋杀……但我无所畏惧。我们必须斗争，无论代价如何”。这位57岁的记者1998年在山西日报上刊文，报道了运城一项吸收百万公款的虚假灌溉项目，随后就在北京被运城警方逮捕并以莫须有的罪名关押，向他提供消息的一位山西省干部也被迫入狱。7年后获释的高勤荣由于在狱中受到拷打，如今只能借助轮椅行动。

即便这样，高勤荣也从未放弃，他相信现在环境已有所改变。“如今中国媒体已经自由了许多，很多报道都支持我的观点，这表明它们没有经过审查。”他最后总结说：“中国人终于发现了他们自己的武器，那就是电脑鼠标！”

（编译：关依然）

来源：

<http://www.guardian.co.uk/world/2013/apr/16/china-anti-corruption-blogging-weibo-citizen-journalism>

英国媒体有关“中国梦”的舆情动态

从2012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国梦”以来，英国媒体对此高度关注，并从多角度、多层面进行了报道。

本简报在Factiva数据库中以“Chinese dream”或“China dream”或“China’s dream”为关键词搜索英国媒体，下载了所有有关“中国梦”的新闻文本。Factiva是世界一流的全球性新闻内容提供商，是由两个世界上领先的商业新闻供应商道琼斯（Dow Jones）与路透（Reuters）集团合资成立的公司，提供Dow Jones Interactive和Reuters Business Briefing两大资源库的1万多种出版物。该数据库提供152个国家或地区、22个语种的新闻。收录了世界上最有影响的2300家报纸的新闻全文，以及280余家广播电视频道的文字稿，这些频道包括BBC、CNN、ABC、CBS、NBC和FOX等。搜索时间从2012年11月到2013年8月10日，共获得85条新闻，简报对统计数据和新闻文本进行了整理分析。

从报道媒体看，这些新闻主要来源于《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经济学人》、《卫报》、《每日邮报》、《每日镜报》、《独立报》、《伯明翰邮报》等。其中《泰晤士报》报道“中国梦”的新闻最多共29条，其次是《每日电讯报》18条，接着是《经济学人》9条。这三家报纸都是在中国事务的报道上能引导英国乃至西方舆论的主流媒体。

从议程内容看，有关中国“国内政治”的新闻最多25条，其次是报道“贪污腐败”的有7条。在有关贪腐的报道中，既有直接报道薄熙来这样的下马官员，也有对官员、普通公众的采访，还有异见人士在海外发表的针对党内贪腐现象的评论。

从关键词上看，“李承鹏”、“习近平”、“瓜农案”、“经济放缓”、“共产党”、“许志勇”是热度最高的词。其中，李承鹏是知名网络人士，曾经是知名媒体人。许志勇是北京邮电大学教师，有博士学位，曾因体验上访和为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上书而受关注。瓜农案指的是湖南临武城管打死瓜农邓正加的案件。英国媒体将这些关键词与“中国梦”放在一起，比如《每日电讯报》转载李承鹏在网站的文章道：“邓正加的中国梦就是有个好收成，然后早

一点把瓜卖掉回家。在我们坐下来讨论中国梦的时候，你应该首先保护好一个瓜农的梦”。

从涉及人物看，提及频率最高的是习近平，接着是胡锦涛、汪洋、温家宝、江泽民、基辛格，以及《中国想要什么》一书的作者汤姆·多克托罗夫（Tom Doctoroff），另外，刘晓波也被提到两次。

英国媒体关注并质疑“中国梦”的内涵。2012年11月，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由于这个表述主要以“民族”和“国家”之梦为内涵，随即就有一些英国媒体指出，“中国梦”到底是民族的梦？共产党的梦？还是中国人的梦？加上中国媒体在对外传播时使用的英译没有统一，有媒体使用 Chinese dream，也有媒体使用 China dream 或者是 China's dream，而英国公众以前熟知的是“美国梦”（American dream），他们认同“美国梦”鼓励普通公众的奋斗精神与个性张扬，而对中国以国家为主体的造梦工程表示怀疑，认为真正能使梦想腾飞的是每个“中国人的梦”（Chinese dream）。2013年3月，习近平在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式上再次指出，“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这段表述不仅完善了中国梦的内涵，客观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英国媒体在此之前的争论。《每日电讯报》一方面指出中国所理想的“中国梦”的内涵，认为“对中国而言，中国梦是要扔掉过去，给其他发展中国家一个可以效仿的发展方式”。另一方面也比较了两种不同的梦，认为“美国梦的内涵在于，只要努力，每个人都有取得成功的机会；中国梦不同于美国梦，更强调集体主义”。《泰晤士报》在一篇题为《中国梦不该沉睡》的文章中提到：“中国梦”看似包含很多东西，他们希望中国梦可以被多重解读。但这错了。政府或者政党无法定义一个国家的真正梦想到底是什么。美国梦不是由政客来定义的，而是由电影制造商、作家、广告产业来定义的。

将“中国梦”与“美国梦”进行了对比。《每日电讯报》在3月18日的一篇名为《中国梦是为了重回世界第一》的报道中这样解读：美国梦的内涵是个人最终可以获得成功。和美国梦不同的是，中国梦更多的是实现集体主义。习近平在去年11月时首次提出“中国梦”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有评论员指出：这个梦想是让中国回到中世纪的地位：世界上最先进最文明的国家。《独

立报》在 5 月 4 日的一篇名为《习近平的口号意味着什么？》的特写中这样解读：“中国梦”的口号在中国影响巨大，“中国梦”包含了美国梦的内涵，但同时也有民族主义和独裁主义重塑的意味在其中。

认为“中国梦”会给世界和周边国家带来威胁。《每日电讯报》写道：“10 年来，我们一直听到中国官方表示：我们不插手国际事务。我们很穷，我们还在发展。但在经济危机暴露出西方资本模式的问题时，中国表现出了有朝一日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的征兆，我猜想不久的将来我们将看到中国逐步插手一些国际事务。”《经济学人》在一篇题为《中国的未来：习近平和中国梦》的文章中认为，中国梦有明显的危机即民族主义。一个国家要是从殖民地受害者转变成要向日本算账，将对它周边的邻国产生重大伤害，这同时也会伤及自身。习近平在 2012 年 12 月份视察海军时还曾提到过“强军梦”，这一说法让英国媒体对于中国接下来的外交路线浮想联翩。此外，《泰晤士报》5 月 8 日发表一篇名为《中国同日本发起新一轮钓鱼岛争端》的报道称：中国加强了对其邻国的领土争端问题的重视。印度、越南、菲律宾、日本先后成为领土争端列表中的一员。他们试图把国家和追求“中国梦”联系在一起，把保护中国领土和消除历史耻辱紧紧地与“中国梦”联系在一起。

从腐败、人权、经济、社会问题等角度唱衰“中国梦”。与长期以来西方媒体以“人权”问题攻击中国不同，此次新闻中有关议题的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是“腐败”（corruption），共出现了 87 次，“人权”（human rights）出现了 11 次，当前腐败已取代人权问题成为英国媒体最为关注的中国议题。此外，经济放缓（slowing economy）一词也出现 9 次，在总体中国经济在国际社会一枝独秀的情况下，近来也出现了一股唱衰中国经济的苗头，再次提出中国崩溃论，这也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而在社会问题上，《独立报》从弃婴现象、贫富差距等来批判社会问题，称中国社会的富人越来越富，还出现了家庭和有权势的官员互相牟利的现象，这与追逐“中国梦”简直是南辕北辙。《卫报》从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等问题切入，指出，“老鼠肉变身羊肉、牛奶奶粉掺假、不合规的学校书本——现在的中国被很多问题困扰着，这些问题挑战着政府的公信力。”《泰晤士报》则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食品卫生安全、中国人个体命运以及大学生就业难等社会问题出发，解读“中国梦”。在一篇名为《大学生找工作，说起来容易做

起来难》的报道中，作者提到，2013 年毕业生就业季找工作非常困难。这一现象对于“中国梦”言论来说无疑是特别糟糕的。在另一篇《挣扎在鞋盒大小的公房里做梦》的文章中，作者指出，中国梦的概念不清晰。有时，它代表的是中国 5000 年以来历史的伟大复兴的蓝图，有时它代表的是在快速经济发展之下，某一个小的个体的心愿。不过，事实上，中国梦是中国人对于自己的生活环境安全保障的一个渴望。中国梦就是当你在挑选牛奶时，不会担心其中有化学添加剂，可以放心地让你的孩子去学校接受良好的教育。

也有不少媒体正面或中性报道了“中国梦”及其前景。《每日电讯报》(2013)发表题为《“中国梦”意在再次领导世界》的新闻，对习近平提出的民族复兴战略进行评价。《伯明翰邮报》写道，“习近平提出了‘中国梦’的愿景，这意味着到 2020 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还要翻一番。我们（伯明翰）能在这个过程中做些什么？”《泰晤士高等教育副刊》在 6 月 27 日从电影的角度解读“中国梦”。在《国家过渡期的幻想》一文中，作者对比了热播电影《中国合伙人》和独立纪录片《成名之路》对于“中国梦”的体现：电影《中国合伙人》是“中国梦”的一个主流阐释——勤奋努力，终有回报。他的片尾所展示的其他企业创始人也传递出这样一份信息——努力耕耘，孕育成功。此外，英国媒体还转载了其他媒体有关“中国梦”的文章，比如 Exchange News Direct 转载了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宋丽萍的演讲“为快速提升的中国经济建立一个多层次的资本市场”。M2 Presswire (2013) 转载了中美第五轮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内容，把国务委员杨洁篪介绍的“中国梦”内涵，以及“中国梦”与“美国梦”相融相通的表述进行了摘录。《利物浦回声报》则对中国的“足球梦”充满期待。

表达出与中国合作的愿望。英国媒体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表示赞叹，并希望英国能够分享到共同的利益。《伦敦旗帜晚报》指出，“中国将是伦敦最需要的合作伙伴，这个亚洲巨人有钱，我们有知识，双方需要合作才能产生出真正的增长”。《伯明翰邮报》引用影子内阁、养老金大臣 Liam Byrne 的话说，“拥抱中国对我们来说没有坏处，如果很好的吸引中国投资，伯明翰将再一次成为世界工厂”，同时指出，“我们都听说过‘中国制造’，我们以后要习惯被中国购买，这对于中国和伯明翰来说是双赢的。我们一直在预言 21 世纪将是亚洲的世纪，全球经济衰退意味着这种可能性在提前，亚洲世纪比我们预想的要提前了 20 年，

但英国还没有准备好。英国首相喜欢说我们正处在一场全球性竞争中，问题是目前别人在快速的前进而我们却错失了机会。”此外，该报还希望伯明翰的科学家们在创新领域与中国大学合作。

对“中国梦”的解读比中国周边国家更正面。虽然中国周边的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等国对中国表现出友好，但大部分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梦”是警惕和戒备的。尤其越南、菲律宾、印尼、马亚西亚等东盟国家从“强军梦”中感受到了威胁。近年来南海局势升温，东盟国家正在日趋以南海问题为中心审视对华关系。越南媒体从中国增强南海军力的角度关注中国“强军梦”，认为是“中国梦”是用民族主义的口号来凝聚部队，用于增强军力以处理领土纠纷；菲律宾媒体将习近平的讲话单向度的解读为，强大的民族就要有强大的军力。马亚西亚舆论也称“中国梦”的口号模糊，其目的只是为了“展示肌肉”。而日、韩舆论也以负面为主。日本媒体在解读“中国梦”时，强调中国对大国权力的追求，多家媒体还谈到中国的人权问题。韩国媒体认为“中国梦”的内涵模糊，更像宣传口号且不具有公信力，认为一个普通人没有尊严的国家很难实现“中国梦”。当然，周边国家的负面舆论与其因地缘政治而构建的自我身份认知有关，这一点与英国有较大的差异。

总体上看，英国媒体对“中国梦”表现出肯定、期待与否定、质疑夹杂的分化现象。在英国媒体看来，中国既是一个充斥着腐败、贫富差距、人权问题等诸多社会矛盾的国家，又是一个充满生机、活力和经济发展潜力的大国。

（编译：吴瑛、顾莹）

英国社会文化动态

看得见的公正——摄像机离法庭还有多远？

英国的法庭历来严格限制庭审录像。追本溯源，这一规定肇始于英国 1925 年《刑事司法法》。该法第 41 条明确规定：无论在民事程序还是刑事程序中，任何人不得在法庭内对法官、陪审员、证人或任何程序的当事人进行拍照或意图拍照、制作肖像或素描。其后有多部法律对此进行了明确和细化。然而随着社会的

进步，尤其是当今媒体的迅猛发展以及审判公开原则在民众中的日渐普及，英国要求庭审录音录像的呼声也越来越高。1992 年，苏格兰率先放开对庭审过程进行实时报道的限制，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随后也进行了改革的努力，禁止由绝对转为需经同意的相对；2010 年，英格兰和威尔士首席大法官宣布允许记者通过推特等网络工具对庭审进行文字直播；2011 年，摄像机允许进入上诉法院，但仅能对法官的宣判程序进行拍摄。时至今日，这一改革仍在推进之中。

2013 年 8 月 23 日英国《卫报》刊文报道了这一领域的最新动向。英国独立电视新闻和四频道新闻制片部的经理约翰·白托称，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庭审录像迟迟无法实现不啻为一种“耻辱”，表明英国司法尚远远落后于其他许多文明国家。他认为审判公开仅仅依靠一纸庭审笔录实现是极为荒唐的，并且敦促政府尽早将法庭审判过程搬上荧幕。

“全世界只要有我们新闻记者的地方，就一定有一台摄像机记录着正在发生的一切，中国、意大利、俄罗斯、法国、德国、美国、加拿大以及澳大利亚无一例外，而唯独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不是如此。”约翰在星期五举行的爱丁堡国际电视节上说道，“对此我们已经采取的种种措施根本算不上激进，比起其他国家，我们差得很多”。

文章称最近数月以来政府一直在采取试探性措施允许摄像机入驻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法院。对待此事各方态度不一，媒体公开庭审是否会导致法庭丧失其应有的司法性和神秘性，新闻界存在着争议。而法官们也表示对庭审进行报道可能引发起哄，还会让杰出的律师处于受到关注的名人地位，影响司法公正。

100 多年前法庭审判过程就已有照片记录，然而时至 100 年之后的今日，庭审录像仍未能得到全面准许，约翰认为太久了。“为何记者们能够在旁听席上用



推特、博客等进行实时报道，而电视这个最强大的媒体工具却保持缄默呢？”

“相比之下，苏格兰的所作所为便是值得称赞的了。现在是 2013 年，如果公众还只能通过一杆笔一张纸

来了解我们的司法系统，那就太荒谬了。我相信在 10 到 20 年之内我们能够达到苏格兰那样的公开。”

（编译：关依然）

来源：

<http://www.theguardian.com/media/2013/aug/23/lack-television-cameras-court>

<http://www.hnxxg.net/view.asp?id=4743>

当童年遭遇手机

手机的普及似乎是一夜之间的事情。当 80、90 后还在回味着自己带有泥土气息的童年时，却发现身边的孩子正手捧那个小巧的机器，沉浸于虚拟世界的



交流和娱乐。对于 00 后来说，这个世界科技化信息化的成就仿佛根本无需理解，他们动一动手指即可在眼前展开多彩的画面。手机及其他类似高科技产品彻底改变了孩子们的童年，同时也增添了家长、学校乃至社会对他们成长的担忧。

在英国，儿童使用手机的年龄越来越小。8 月 23 日英国《卫报》刊登的一项对 1420 位父母的调查研究显示，大约每 10 个学龄儿童中就有一个在 5 岁时拥有了手机，而在孩子 11 岁上初中时父母基本上都会为他们配备手机。研究还指出，父母给孩子购买手机平均花费 125 英镑，而自己则平均 246 英镑。尽管有此价位差别，42% 的父母并不关心孩子的话费账单，只有四分之一的父母保持着关注。孩子们每月的话费开销平均在 11 英镑左右，比起他们的父母每月 19 英镑的确少一些，但有 11% 的孩子每月话费甚至超过了父母。

电信专家厄涅斯特·多库表示：“为孩子配备手机固然是出于安全考虑，便于紧急情况下的联络，但我敢说很大一部分父母给孩子买智能机只是为了不让他们在无聊的时候霸占自己的手机。”他建议父母追踪孩子的手机使用情况。“孩子

们在家时，确保他们是在使用无线网络而非 3G 或 4G 流量浏览网页。”

另外研究还发现，父母在他们最大的孩子手机上的花费比弟弟妹妹要更多。只有不到 3% 的父母取消了孩子手机的上网功能，让他们只能打电话或发短信。

为与国内儿童的手机使用情况作一比较，笔者又搜集了国内一些类似调查数据，其中较全面和具有可比性的是 2011 年 3 月 7 日重庆商报上刊登的对 230 名小学生所作的调查。这 230 位小学生均为 00 后，进行问卷调查后整理得出，其中 72.5% 的学生拥有手机，而没有手机的也多反映用父母的手机上过网。10.4% 的小学生在 6 岁前就开始使用手机或其他手段上网，61.4% 的学生为 6~9 岁，25.7% 为 9~12 岁。费用方面，每月手机上网消费 10 元以下的占 60.4%，10~20 元的占 18.7%，20 元~50 元的占 18.7%，还有 2.2% 的小学生手机上网月消费 50 元以上。虽然这一调查侧重使用手机上网的这一方面的状况，但有 85.7% 的学生表示使用手机上网，因此也可反映出大致的手机使用情况。

上述两项调查所显示的结果并无过大差别，不论英国的还是中国的孩子，他们的童年都无可避免地打上了手机的烙印。但是在孩子们的安全获得保障的前提下，不可忽视手机对他们的身心成长带来的副作用。学校和家长应承担正确引导儿童使用手机的责任。

（编译：关依然）

来源：

<http://www.theguardian.com/money/2013/aug/23/children-first-mobile-age-five>

伦敦城区的中产阶级化

近日，《卫报》在其网站上播放了一系列引人关注的纪录片，主题为伦敦贫困地区的中产阶级化。其中一部由小说家 Alex Wheatle 制作，着眼于南部的布里克斯顿地区。此处曾以 1981 年的大骚乱而著称，然而如今却布满了露天餐厅，出售披萨、玉米卷之类的食物，令在此流连的上层人士眼花缭乱。这段视频相当



值得一看：里面记录了里克斯顿地区的旧貌（充斥着雷鬼音乐与可疑的路边摊）但也并未将责任一味归咎于外来者身上。

之所以会对布里克斯顿感兴趣，原因在于我已在此居住了两年多，亲自经历并促成了它的转变。上周，我逛了一下布里克斯顿音乐节（类似小型的诺丁山狂欢节）。我发现，新旧布里克斯顿居民之间的界限十分明显。来自公立学校的女孩子们坐在满头小辫的人旁边喝着便宜啤酒。我偶然听到一个小孩对他的朋友说他“以前从来没在布里克斯顿音乐节见过这么多白人。”不过，这一地区的中产阶级化并未能彻底洗脱其先前的恶名：当晚，一名年轻男性被捅伤。

奇怪的是，从统计学角度来看，布里克斯顿与其他地区正相反。整个伦敦市的人口中，“英国白人”（需同时满足白人和具备英国国籍两项特征）的比例急剧下降，因为人们向家乡郊区大量地移民。2002 至 2011 年间，尽管整体人口数量有所增加，伦敦市“英国白人”依旧减少了 62 万。每个镇里，英国白人的登记数量都在减少，有些地区如纽汉姆减少了 38%。

然而整体来看，有一些地区也同样出现了相反的趋势。布雷斯顿山地区英国白人数量在 2001 到 2011 年间有所增加，哈克尼、伊斯灵顿、旺兹沃思和卡姆登等地的大部分地区同样如此。哈克尼地区的斯托克纽因顿和达尔斯顿进程尤其快——从 15% 涨到了 26%。

尽管已经取得了足够的资料，我依旧有如下猜测：在伦敦，有两种相反又互补的人口迁移正在进行着。一方面，业主们趁机转手房产赚钱搬到郊区更加豪华

的住宅区。这些人里面有许多白人工薪族，也有一些是富有经济头脑的印度人或非洲人。此外，更多的上层人士如我则选择在此购买房产（更通行的做法是租赁）。

值得研究的是第二部分：为什么上层人士决心回到曾被他们抛弃的市区？以下为几项原因。90年代至今，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大幅增加，造就了许多习惯都市生活的年轻人；同时，经济的发展带给伦敦许多技术工作岗位。因此这些人们趋向于留在伦敦。近年来，驾车出行也日渐式微，因为城市里有着构建在高人口密度之上的公共交通。此外，这些人们结婚成家也越来越晚，因此他们愿意长期住在不带花园的小型公寓里。

同样重要的是，一些曾经不利于都市生活的因素现在也已消失。在六七十年代，泰晤士河上遍布着乌烟瘴气的码头与发电厂。直到90年代中期，犯罪率依旧随着毒品的泛滥而居高不下。最可怕的是，连学校里也充满了穷凶极恶的恶徒，就连最坚定的绅士也不得不为了自己的孩子而搬到治安相对好的萨里等地。

如今，犯罪已得到遏制，特别是在内城。伦敦城市内部的学校教育水平更是远超其它地区。有统计数据为证：2011年，威斯敏斯特接受学校免费饭菜的孩子们有51%升上了高等学校；而在赫特福德这一比例仅有22%。这一趋势还在不断加强中：20年前，不管城市有多吸引人，年轻教师依旧不愿在此工作，因为他们觉得毫无前途可言；如今，尽管薪资已经很久没有上涨过，伦敦的学校已经能够招到足够的教师。

因此，中产阶级化进程已经不仅局限于年轻单身高学历者，同样还包括了家庭的改变。它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风潮，并将继续影响更多本不会被影响的地区。从2011年的调查至今，这股风潮估计已经从布里克斯顿扩散到了更受年轻人青睐的达尔斯顿。刚刚毕业的学生也开始选择像佩克汉姆或者纽克劳斯这样曾经污浊不堪的地方。将来，他们一定会让这里脱胎换骨。估计在2021年的调查中，令人担忧的“白人逃亡”现象将会出现逆转；到2031年，我们或许要开始担心乡下可能会过于贫困了。

注：中产阶级化是社会发展的其中一个可能现象，指一个旧社区原本聚集低收入人士，重建后地价及租金上升，引致较高收入人士迁入，并取代原有低收入者。其转变过程可能因着重建速度而需时多年，但引伸的结果是本区生活指数提高，原居住的低收入者最后可能反被新迁入的高收入者歧视，或引致原居住的低

收入者不得不迁离往更偏远或条件更差的地区维持生活。该地区吸引了第一批高收入者迁入后，就转而成为吸引其他同阶层人士迁入聚居的引力，使过程越加快速。

社区的人口结构亦会因而改变，最显著的是少数族裔会首先迁出，新迁入较富裕的新一代亦通常是单身或新婚家庭，导致平均家庭人口减少。

（编译：刘文轩）

来源：

<http://www.economist.com/blogs/blighty/2013/08/londons-demography>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3%AB%E7%B4%B3%E5%8C%96>）

<http://www.theguardian.com/uk-news/video/2013/aug/02/alex-wheatle-gentrification-brixton-video>



新王子降生，登基仍尚需时日

伊朗外交部与以色列总统均表示了衷心祝贺。普京与奥巴马同样表示恭喜。在靠近当年路易十六被斩首处的爱丽舍宫里，法国总统霍兰德似乎尤其开心。苏格兰与威尔士的民族主义者领袖们，以及保守党和联合党的领导人们都表达了类似的祝贺，与曾经的社会主语劳动党相互辉映。新王子的降生不仅是一出现代的

耶稣降诞记，更像电视连续剧一般，影响力蔓延到了政客无法触及的地方。尽管外界一片欢腾，查尔斯王储和另外两位继承人（威廉王子以及新降生的乔治·亚历山大·路易斯）却使得整个王位制度处于相当特别的境遇。

相对而言，英国给了年轻人较好的机会。在城市里，40岁的人已经可以功成名就。总理只有46岁，和副总理相同。反对党领导人比他年长3岁。然而王室情况却相反。到今年9月，64岁的查尔斯王储将成为有史以来等待即位时间最久者，威廉王子即位时也必然超过50岁。排除疾病、意外或倒行逆施被斩首这些情况，这位婴儿大约能在2070年登上王位。

如此冗长的等待，不仅对继承者来说无比乏味，更会对制度造成不利。查尔斯王储早已忍受着“铺张浪费、冷酷无情、花销无度”这样含沙射影的指责，却难以为自己辩驳。即使是坚定拥护皇室的《每日邮报》，近日也撰文抨击查尔斯特地派人负责运送自己喜欢的垫子，字里行间对被施以这项差事的人充满同情。人们希望王室继承者能够真正有为，而非等待，这一看法本无可厚非，然而后者的工作恰恰正是等待，王储的孙子也必将会面临这一困境。

女王则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自从1649年查理一世被处死之后，仅有两位统治者能够如同伊莉莎白二世一样，在年轻时即位并且统治足够长的时间：乔治三世（22岁即位）与维多利亚女王（18岁即位）。尽管出身自好战的汉诺威王朝，偶尔会和美国发生冲突，两位在国内却深受拥戴。伊莉莎白二世则已经成为了王权的象征，同样在国内有着无比的威望。据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全英国六千三百万人中，只有一千五百万人支持建立共和政体。

然而这一切不一定会永远保持下去。王室成员们的作为如此飘忽不定，公众对他们的看法也瞬息万变。在剑桥公爵夫人凯瑟琳结婚前，各种小报都在发行印着她照片的“纪念版”特刊，把她称为“等待的凯特”，讨论她什么时候才会找到稳定工作。比起等上好几年才能结婚，经过五六十年直到垂垂老矣之时才能继承家业更会招人嘲笑。假如没有什么变故的话，这样的命运将会一直延续到下个世纪的英国王室身上。

通常，英国皇室继承问题都由欧洲大陆来解决。在过去，当不列颠缺少继承人时，会引入欧洲的王子。现如今不列颠王室继承人过多，则需要从欧洲学习经

验了。荷兰女王贝娅特丽克丝（75岁）和比利时国王阿尔贝二世（79岁）近日均宣布退位，连教皇本笃十六世（85岁）也退位了。不列颠的统治者们或许也应该效仿此举。

是否会有某种方法，能在维护皇室的尊严与合理规划之间寻求到平衡？当目前已经即位61年的女王满90岁时，她将会超越原来的在位记录保持者维多利亚女王（在位63年），在那时，她或许就应谢幕了。查尔斯王储则应当在80岁时仿效此举，威廉则是70岁。当王室退位年龄和国家退休年龄相似的时候，问题会得到解决，乔治·亚历山大·路易斯也将得以在尚未衰老时继承王位。

（编译：刘文轩）

来源：

<http://www.economist.com/news/leaders/21582266-how-continental-pragmatism-and-management-theory-could-improve-lot-george-alexander>

爱德华·米利班德与工党的未来

工党议员 Tessa Jowell 警告说，工党党内人士对党魁爱德华·米利班德的公开批评破坏了党的内部团结，给民众留下工党一盘散沙的印象。

在卫报“观察家”栏目中 Tessa 写道，工党内部一部分人士应该明白，是他们的公开批评帮助保守党造成了工党“夏日危机”的局面。她说，这种不忠诚将可能导致工党将下次选举时的竞争优势拱手让给保守党。

上周，John Prescott 在周日镜报中写道，工党在这个夏天里，既没有让公众理解和认同其施政方针，也没有把握最后的机会，质询保守党执政中出现的问題。他希望米利班德“踢出”其影子内阁中表现不佳的成员。

随着这些批评而来的，是工党工党内部人士对米利班德的批评，其中包括 Andy Burnham 接受卫报采访中所说，工党必须“更加大声”的表达，在明年春季前向大众提供有吸引力的政策方针，并以此向保守党摊牌。

而 Tessa Jowell 说，工党所有党员都有权参加竞选党魁，但与之相对的义务和责任是，一旦党魁被确定，工党上下就应该一致忠诚的支持他。“只有忠诚才能保证我们向前航行，不忠诚将毁掉我们的大船。”她认为上述一些对米利班

德所谓的“建议”本应该私下提出，公开声明没有任何建设性作用，反而给公众造成工党内一盘散沙的坏印象。

Tessa Jowell 女爵，这位来自伦敦达利齐和西诺伍德选区的工党议员是爱德华·米利班德影子内阁的成员。她说：“作为工党党员，我们不应该像评论员那样公开议论国会中的政事浮沉，我们是这场政治较量的参与者，我们的所作所为将会影响上百万人的生活。

如果我们让大卫·卡梅伦和他的保守党政府继续下一届任期的话，我们的选民，而不是我们这些政客们，将会承担后果——工资增速慢于物价导致生活质量降低；家庭经济状况结局导致老人无所养，幼儿无所依；没有人能站出来对年轻人负责，任凭他们处在没有工作，没有自己的家庭，没有希望的生活中。

Tessa Jowell 建议，这些米利班德的批评者应该多花时间拜访摇摆选区选民，帮助那些选区中的工党候选人赢得选举。这才是政治较量的最前线。

人们广泛认为，爱德华·米利班德将会全面更换他的核心团队。党内一些声音希望他能够在自己的团队中，加入一些布莱尔和布朗时代为公众熟悉的老面孔，以提升工党的媒体形象。

但是上周，前内政部长 David Blunkett 接受 BBC 广播四台“今日”节目采访说，老面孔们显然不会再回来了，我们要找到有能力做出贡献的新人和新办法。

“我们能做的是为团队加入热情，有精力并积极进取的年轻人，他们更加乐意听从我们的建议并做得更好。”

（编译：程是颢）

来源：

<http://www.bbc.co.uk/news/uk-23830872>

不堪推敲的“青年合同”

据报道近日英国就业与退休保障部门夸口声称，政府颁布的工资鼓励政策方案将使得英国企业提供超过21,000个工作岗位给青年人，哪怕是基于其长期失业的风险。这着实一定程度上唤醒了低迷的就业市场，也激昂了青年择业的低

落情绪，尤其是当前面临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境况中。但是分析以下的统计数据却使我们不禁对他们的信心表示怀疑。

自去年4月以来，英国政府提供的临时工资补贴就已高达 £2275，以此来鼓励工作单位采用处于18—24周岁之间的青年人群进入不同的工作项目，该方案也旨在使更多的青年人投入到企业的工作中。据表明，在7月和12月，各工作门槛均有所降低，提供较多机会。而且，于单位而言，雇佣18-24岁之间人群的任何组织均可享受雇主补贴的优惠待遇。英国劳动与退休保障部门声称，受到补贴的雇主所提交的“青年合同”数量已高达21,000张。当青年人开始参与工作的时候，该负责人就可以提交申请。从表格一也可以看出，在青年合同开始扩散使用之前，工作人数的数据平稳波动于每月1,000左右，之后便有较大改变。

然而，正如约翰·麦克德莫特所说，开始一份工作与正在做一份工作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就业低迷的英国劳动力市场，就业率也是一个长期的瓶颈性问题。政府正努力尝试着规划一个称为“回归工作”的政策，使人们坚定地安于一个岗位，而不争先恐后地涌入拥挤的就业中心，造成更大的就业负担。因此，它只给在工作岗位上已奋战达13个星期的人员一半补贴，26周之后再给予剩下的一半。

于观察者，查看最后的支付情况而不是申请过程能给我们一个更直观的感受，更好地理解这项计划的成功。在实施一段时间的前提下，政府劳动与保障部门也公布了付款总额的的具体结果。据表格二的相关数据可推断，只有十分之一数量的申请补贴为雇主所为，而在金额总数为4,690英镑的前提下，只有价值2,070英镑的补偿真正传递给了已工作达26周以上的职员。这也显示出该政策如实执行过程中的困难性。负责人员也表示，年轻人在一个相对不优越的岗位上工作超过六个月是很困难的事情，正是年轻人固有的通病直接导致了该项政策难以实施的现实，这也是政府真正应该关注的焦点所在，而不是那些所谓多得惊人的申请数目。

此外，从表格二中也可见出符合标准的工作达26周以上人群的补贴支付情况也着实令人堪忧，尤其当下正是小试牛刀的紧急岔口，第一个队列在资格审核中的结果严重影响着之后的一系列标准与实施。不过，该计划还有另外一个两年的运行时间机会，如果增加的申请数量能真正转化为更长期的工作，那便也是达到

了该政策一直在追求的目的。目前政府已经拨给160,000英镑的补贴资金用于该政策的实施,但在当前利率的情况下,它将远不及该方案前提假设的巨大需求。

在如此紧要关头下,还有更棘手的问题是,尽管运行中的资金股份以及“青年合同”的实施,的确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就业情况,可是青年失业率却始终没有降低,那些待业在家超过一年的青年人数反而继续上升。这两类数据也预示着方案潜在的巨大损失以及对人类社会的危害性。

当然,我们不能将这两种趋势的加大归咎于任何一个部门或是某项政策,毕竟青年失业率上升的趋势是出现于金融危机之前的。但参与者也难辞其咎,显然他们已经做了一些错误的决定。比如,放弃由前政府建立的未来就业基金的做法,因为劳务和退休金部审查的证据表明该政策是有效的,运行该工作计划的提供者已然受到了国家审计办公室的严肃批评。

“青年合同”的不堪推敲促使着政策制定者去挖掘,通过福利系统推动年轻人就业是否稳妥可行,而这实际上也是最初的规划与设想。当然,一项政策的实施必然会牵动其他相关缺口,或恶化或改善,但惠民政策的推行势在必行,提高青年就业率的问题也是任重而道远。

(编译:徐景)

表格一：
数据来源：管理信息（工作计划提供者与就业，以及劳动力市场体系）

Month 月份	Job starts 工作人数
Apr-12	490
May-12	720
Jun-12	840
Jul-12	1,060
Aug-12	1,030
Sep-12	1,120
Oct-12	1,350
Nov-12	1,200
Dec-12	880
Jan-13	1,160

Feb-13	2,000
Mar-13	2,660
Apr-13	2,780
May-13	4,180
Total 总数	21,460

表格二:

数据来源:工资激励交易支付数据(工作项目与就业中心)

Month 月份	Eight-week interim payments 8周间歇支付	Payments of between 14 & 25 weeks 14-25周支付	18-week balance payments18 周平衡支付	26-week full payments2 6周全支付	Individuals for whom a payment had been made 收到付款的个人
Jun-12	20	-	-	-	20
Jul-12	70	-	-	-	60
Aug-12	170	-	-	-	160
Sep-12	140	10	-	-	150
Oct-12	370	40	20	10	420
Nov-12	160	40	100	110	310
Dec-12	180	50	80	190	400
Jan-13	220	80	130	370	660
Feb-13	260	80	110	340	670
Mar-13	180	70	120	420	660
Apr-13	230	60	120	350	640
May-13	230	40	110	280	550
Total 总数	2,230	470	800	2,070	4,690

“试管”牛肉——未来之肉

一个普通的汉堡配上薯条的价格大约是三英镑，但下周，价值 25 万英镑的史上最贵牛肉饼将被送上一批受邀者的餐桌。这“天价”牛肉饼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是从牛的干细胞培养出来的实验室牛肉。

这块珍贵的牛肉饼由三千份条状的试管牛肉组成，每份肉只有米粒大小。科学家们认为，这次把试管牛肉端上餐桌，或将推动试管肉进入市场。消费者或能够在未来五到十年内在超市买到试管肉。

试管牛肉由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的生理学家 Mark Post 教授历经数年培育，经费由一位匿名富人赞助。据悉，该赞助者可能会是第一个品尝试管牛肉汉堡的人。

Post 教授在早前一次 The Independent on Sunday 的采访中说：“目前，我们用 70% 的农业资源去饲养家畜以获得肉类。我们需要其他生产肉的方法，否则将来肉会变成富人才买得起的奢侈食物。”

科学家认为，人造肉可以帮助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肉类需求。据预测，世界上现存的大部分森林和草地会因饲养肉牛而在本世纪末消失。

从理论上讲，从一头动物身上提取的干细胞可以培养出的大量的肉，肉量是一头肉牛身上可供食用的肉的一万倍。除此之外，试管肉将减少食用肉类给环境带来的破坏，包括减少饲养家畜所需的土地、水和饲料，同时有助于减少温室气体和其他污染物的排放。

对于素食主义者和绿色运动组织来说，基于对动物福利的保护，试管肉会使肉食主义者的菜单变得更容易接受些。

动物权益保护组织颇为支持试管肉，一些素食主义者也表示，他们很乐意食用人造肉，因为人造肉和真的肉是“同根而不同质的”。

肉类消费是一个巨大的产业，全球每年生产约两亿二千八百万吨肉，美国一年的牛肉零售额就高达 500 亿英镑。据世界农粮组织称，到 2050 年，由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的需求推动，全球肉类消费将是现今的两倍。

要把试管肉变成受欢迎的，价格公道的消费品，目前仍存在技术拦路石。其中最大的困难是，真正的肉是由各种不同的细胞组成的，而不仅仅干细胞所产生的肉质纤维。

Post 教授说，可以尝试往试管肉中加入脂肪组织使肉更为可口，也可加入其他营养物质使其营养价值可与真的肉媲美，甚至通过除去饱和脂肪使其更健康。

英国食品标准局表示，在人造肉上市销售之前，须取得相关许可。生产商必须证明人造肉已进行各项安全测试，且与非人造肉有同等的营养价值。

但是，相对于试管肉进入市场的技术、监管和商业上等问题，更重要的是消费者是否能接受试管肉——这些在工厂的发酵桶中，从搏动的一滩滩粉红色纤维里“长”出来的肉。（陈慧妍编译）

注：干细胞：具有自我复制能力的多潜能细胞

（编译：陈慧妍）

来源：

<http://www.independent.co.uk/news/science/special-report-in-vitro-beef--its-the-meat-of-the-future-8735104.html>

英国小王子的影响力

在二十一世纪，一个婴儿的出生能否影响到一国的综合实力？如果是那位在英国出生的温莎王室后代，那自然可以。乔治王子的影响力或许不像五个世纪前的都铎王朝继承人，对英国与西班牙间平衡至关重要，但他可以影响英国在世界上的软实力。

无论好坏，英国王室仍在全球政治中有一定影响。

当然英国君主是指五十四国组成的英联邦的元首。即使女王已不再是国家元首，但消费者仍买王室“品牌”的账。而在美国这一反叛专制统治的殖民地，乔治三世在教科书中仍被形容为坏人，同时许多评论者（错误地）声称英美特殊关系已终结。但于此地，人们仍早早起床收看王室婚礼，如今更是欢庆新王子的诞生。电视主持人激动不已。早在王子出生前，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和纽约时

报(New York Times)的调查就显示, 71%的美国人认为英国王室“很好”, 只有15%的人反对。这与英国王室在本国得到的77%的支持率出奇相似。

我们生活的时代充满名人, 英国王室面对摇滚明星和运动员的竞争, 仍魅力不减。在信息时代, 实力不仅限于军队的强大, 还在于打动人心力量。英国王室的故事动人心弦, 并且那些一夜成名的人更持久。

近年, 英国在软实力方面表现出色。不只是英国广播公司和英国文化协会闻名世界, 伦敦奥运会和残奥会的成功举办也大大促进了公共关系。2012年。

《Monocle》杂志的国家软实力排行榜上, 英国超过美国跻身榜首。

英国政府在软实力上投入更多精力。2010年英国《战略防御与安全评估》和《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在削减防务支出问题上强调了软实力的价值, 而外交大臣威廉黑格则称, 软实力是英国国际影响力的“关键组成部分”。议会上议院“软实力与英国影响力委员会”正举行听证会。当然, 王室则是研究对象之一。

软实力即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买卖来达成目的的能力, 但它并非万灵药。然而硬实力也如此, 伊拉克战争就可证明。如果希望推翻暴政或是抵制侵略, 硬实力尤不可少。但如果目标是推进民主人权, 那么软实力或许更有效。大多数情况下, 硬实力和软实力资源的结合决定了明智的战略。利用合法性和民意等软实力资源, 能够营造出良好的环境。

推进一国形象并不新鲜, 但创造软实力的环境于近几十年来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 目前世界将近一半都是民主国家。在此情况下, 影响舆论的外交活动与传统的高层会晤一样重要。信息创造出力量, 而如今更多的人拥有这样的力量。技术进步也大大降低了处理与传播信息的成本。

其结果就是信息爆炸, 并产生“充裕的悖论”。大量信息分散人们的注意力。本世纪的一大讽刺是, 英国昔日君主制的民主残余, 仍能以低成本受到世界的关注。

(编译: 徐诗丛)

来源:

<http://gulfnnews.com/opinions/columnists/infant-prince-source-of-real-world-power-1.1213321>

英国将对移民征收医保税

英国卫生部长 Jeremy Hunt 7 月 3 日称，未来移居英国者将需预先支付至少一千英镑，用以涵盖他们在英国五年内的医疗保健费用。

Hunt 还宣布，六个月以下的外国短暂居留者将不再享受免费就医的福利，但这其中不包括欧洲游客。他们会继续享受免费的英国国民保健服务与急诊服务。

针对外国移民的医保税额暂定为至少 200 英镑每年，这也意味着申请五年签证将需支付共计 1000 英镑。对此，争论仍在继续。

目前，持六个月以上签证的国外短暂居留者只要到达英国境内即可享受免费医疗。部长们正在讨论能否实行强制的个人医疗保险作为替代办法，这一计划的概述已包含在一份跨政府部门意见征询书中。该意见征询书中还详细阐述了保守党准备停止对非法移民提供公共服务的决定，并期望在下一次大选前将净移民人数控制在每年 10 万人以下。

针对移民征收的医保税可能再次激起关于英国“关门停业”的议论，此举也将阻碍英国高等学府吸引海外学生。去年有超过 27 万非欧洲人来到英国学习或工作，其中印度人和中国人占到 15% 以上，他们将受到该税收政策的影响。

Jeremy Hunt 说道：“我们希望居住在英国的外国人和英国本地的纳税人一样做出应该的贡献。我们也希望能够控制非法移民。我们实行的是国民保健服务而非国际保健服务，所以我们决心杜绝对该体系的滥用。”

但前自民党部长 Sarah Teather 严厉批评了这一计划，她认为该政策下，一些有志于在英国工作并能够对经济起到推动作用的社会精英会改变主意。她说道：“我听说英国希望‘开门迎客’，但现在的举措似乎恰恰相反。”

部长们还准备进一步完善该计划，要求将来私人房东掌握租住他们房屋的移民的身份。Teather 对该计划也提出了批评，认为这既不公平也不可行：“任何面貌或口音稍像外国人的人都将无法租到房子。”

来源：

<http://www.guardian.co.uk/uk-news/2013/jul/03/immigrants-levy-healthcare>

英国人对外来移民不满加剧

研究表明,过去这几十年来,在大批外来移民对英国经济社会影响的问题上,英国人的态度“愈发消极”;调查显示,外国打工者和成绩较差的留学生在英国尤为不受欢迎。

最近出炉的英国社会态度报告表明,近几年来要求减少外来定居者的呼声“愈发高涨”——这与英国史上最高的外来移民浪潮相呼应。

而专业技能较差的被调查者普遍“最为突出”地体现了这种愈发强硬的态度。外国打工者和成绩较差的留学生在英国尤为不受欢迎。

这种社会态度将促使英国政府将净移民量(人口移动导致的英国人口年增加量)由当前的 20 万余人缩减至 2015 年的“几万人”。

“我们有证据表明,此种举措的大体方向是与英国公众态度相一致的——较高的素质是选民们支持移民的主要依据,”由曼彻斯特大学政治学讲师罗伯特·福特带领的作家们说。

社会态度报告认为,继 1997 年新工党当选及次年人权法案通过之后,移民管制“松散”,限制庇护的手段“有限”——随之而来的则是来自 2004 年新加入欧盟的 8 个东欧国家的“大型移民浪潮”。

对过去两年所做调查的分析显示,“减少移民总量的要求持续升温”。1995 年,约 39%的受访者认为移民数量应该“大幅减少”,到了 2011 年,该数据增长至 51%,并更于 2008 年达到了最高点 55%。认为国外移民对英国经济“影响很糟”的比例从 2002 年的 11%跃至 2012 年的 21%,对该问题持中立态度的人数也在这 10 年间大幅跌落。同期,认为国外移民的文化影响“非常糟糕”的人数比例从 9%攀升至 21%。

而至于一代或二代移民者,他们中仅有超过四分之一的人认为外来移民对英国社会有消极影响。

经详细提问,结果表明移民者中的专业人士以及出色的学生相较而言更受青睐,尤其是对自身受过良好教育的受访者来说。

福特教授带领的作家们做出了这样的结论:“过去这 15 年的移民潮流达到了英国历史上的最高潮。”

“这种移民高潮使得英国公众要求减少移民的呼声更加高涨，同时愈发强烈地认为国外移民对当地经济和文化有着不良的影响。”

与此同时，另外一个独立的民意调查显示，70%的英国人希望限制英国高校和学院录取的海外留学生人数。

同样 70%的人认为英语水平低的人应被遣出英国；甚至更高比例的人认为原本前去读书的外国人如果私自在英国工作，则应被驱逐出境。

英国移民观察组织组织进行了囊括 2910 名成年人的 Yougov（“你的政府”）调查。“有些人宣称公众对外国留学生入境之事漠不关心，这项调查揭穿了 this 谎言。”该组织主席安德鲁·格林爵士如是说。

（崔晓光编译）

来源：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uknews/immigration/9546301/Britons-increasingly-negative-about-impact-of-immigration.html>

英国外相声明联合国深入调查叙利亚化学武器问题

英国外相紧急呼吁联合国应当获取在叙利亚进行化学攻击的地点并讨论英国在支持联合国方面的努力。

外相威廉·黑格在接受 2013 年 8 月 23 日的新闻采访中，谈到联合国小组获取 8 月 21 日发生在叙利亚大马士革附近的化学攻击地点的重要性，并承诺英国将会支持紧急调查。



英国外相威廉·黑格

以下为威廉·黑格发表的声明。

现在，距离有关叙利亚化学攻击的报道发出的时间已经有 48 个小时了。报道称在大马士革附近，发生了使用化学武器的恐怖暴行。我们将会目睹有如在电影发生的场景，包括许多受此影响的孩子，当然还有成百上千的人因此丧生。在一个人道和文明的世界，没有什么东

西是可以被忽视的。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全世界都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就意味着即将前往大马士革的联合国团队，只需花费 20 分钟，就能够到那里进行调查。

英国在 8 月 21 日晚致电询问联合国安理会，安理会成员表示他们支持联合国小组去叙利亚进行调查。然而，他们还没有能够决定。同时，阿萨德政权似乎已被证实有所隐瞒。为什么安理会还没有允许联合国小组去那里？但是，当然，我们希望联合国小组能够去那里。

今天早晨（2013 年 8 月 23 日），我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讨论了这个问题，他赞同时间是至关重要的这一观点，并且迫切要求联合国团队能够不受阻碍地到达目的地，此外，他准备派遣其他人到大马士革。于是我告诉他，我们会大力支持他，英国会尽全力帮助他并且会鼓励其他国家一起帮助他的。

我希望稍后可以和俄罗斯外长谈论这一问题。昨晚，我已经和美国秘书克里以及其他一些国家讨论了这一问题。土耳其外交部长昨天参加了此次讨论，今天卡塔尔外长也将会到达这里。

因此，我们目前的首要任务是确保联合国小组能够光明正大地进行调查并且公布出事实真相。

如果我们在他们调查的这几天里不能保证上述这些话，那么证据在短短几天内会变得更难以掌握，因为时间是至关重要的。这样的后果是，我们只得返回安理会去获取更有权威性的授权并且让世界共同发出更有力的声音才能获取证据。

我们正试图联合世界各国达成以上目标，查明叙利亚化学袭击的真相，给世界一个满意的答案。

（编译：蔺皓明）

来源：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foreign-secretary-un-must-get-access-to-chemical-attack-site>

英国人消费选择倾向选择折扣店



由于家庭预算的紧缩，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转向超市如阿尔迪（德国最大的连锁超市）、利德尔（德国施瓦茨集团旗下的零售企业）和高街上的低价商店如镑店。

分析者认为，随着困难家庭努力地赚钱，英国很可能成为一个折扣消费者的国家。折扣商场将越来越流行，目前商店预算价值 7.5 亿英镑，预计到 2017 年将增长 65% 价值 12.4 亿英镑。部分零售商的成功来源于他们形象的改变，从“廉价”变为“更好的价值”。

资本经济学首席英国经济学家维奇·瑞德伍德表示，折扣商店已逐渐成为主流并被人们所接受，人们的态度已经改变，他们不再是看到这么多的便宜商品而是看到它们提供了更好的价值。商店已经做了很好的工作，改进他们的形象和质量而不仅仅是便宜的商品。

来自零售商罗文研究和慈善 IGD 的报告发现超过四分之一的购物者计划更多地在价值食品商店购物。目前已有大约一半的人口使用这类商店，而这个数量将不断上升。研究人员发现目前 85% 的使用者仍计划持续这样做即使他们的财务状况改善。

詹姆斯·拉塞尔，罗文的商务总监说：“折扣正在蓬勃发展并且日益重要。然而，这不是一个零售行业的短期趋势，实际上是一个长期的文化转变。我相信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英国商店方式的永久的改变。”

研究人员发现折扣商店之所以吸引广泛购物者的原因不仅仅是紧张的预算。随着行业发展,更多的食品和家居用品制造商正推动他们的产品到更便宜的批发市场中。

罗素说:“货物的范围可以在低成本存储中扩大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他补充道,“许多消费者已经改变了他们的购物习惯,开始尝试不同类型的商店包括折扣店。未来几年我们将看到更多的折扣商店经营者销售更多的产品给各种各样的人。我相信这是一个永久性的变化。”

据报告称,高街折扣店已成为重要的存在。随着高街折扣店越来越重视它们的购物范围,它们将吸引新顾客,并随着新鲜食物的引进,它们也将被频繁光顾。同时折扣店也认识到购物体验的重要性因而改善店内环境。

(编译:潘佳威)

来源:

<http://www.express.co.uk/news/uk/412866/Why-even-more-of-us-plan-to-shop-at-discount-stores>

重 点 报 道

你在笑什么?

——论英美幽默差异

西蒙·佩吉

你可以花上很多时间寻找英国喜剧和美国喜剧的不同,然后得出一个很讽刺的结论:二者几乎没有区别。我和导演埃德加·赖特的第一部电影《僵尸肖恩》是由电视剧《空间》扩展而成,改写剧本那会儿我们就指望着某种喜剧的共通性在这个“游手好闲的乡下人打僵尸”的故事里发挥作用了。我们坚信幽默是可以翻译的,而事实证明确实如此。写作过程中我们只作了一处对话上的微调,把pissed换成了drunk,以避免英式英语带来的误会。这部电影在美国大获欢迎,由此看来,要想克服所谓的英美幽默差异,要做的只是换一个词这么简单。

不过,关于幽默仍有一个文化上的未解之谜。比如,让一群自封的社论家骑着高头大马,穿得和《巨蟒剧团之圣杯》里的骑士一样,英国人对这样的喜剧场

景耳熟能详，而美国人就看不懂，他们没见过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讽刺的是他们对此也不以为然。“美国人不兴讽刺这套”——这话听着不错，但严格来说它不准确。和美国朋友相比，我们英国人用的讽刺是多了那么一点儿，但对我们而言“讽刺”就像水壶，在生活的一隅永不停歇地冒着蒸汽哼着歌；对美国人而言“讽刺”更像是漂亮的茶壶，在需要的场合才会被拿出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会有粗心的美国人看到反讽却露出困惑的表情。我们不妨看看我的美国朋友 A 和英国朋友 B 之间的一次交流：

B：“我上周参加了我祖父的葬礼。”

A：“这消息真令人难过。”

B：“哦别觉得抱歉，要知道那可是他第一次为酒钱买单。”

A：“是吗。”

这种情况下，我的美国朋友并不是粗心或者迟钝，他只是不懂得用幽默掩盖真情实感的必要。这种倾向在两国人使用“免责声明”的差异上体现得更明显。美国人讽刺完了总要声明一下自己刚刚是在讽刺，把轻快的“我在开玩笑”挂在嘴边，即使话语本身听起来已经足够离谱足够反讽也是如此，比如：

A：“你要是今晚不出来，我就让你吃枪子儿…开玩笑开玩笑。”

当然，对美国人来说这有可能发生，因为他们确实可以持枪而且也常常开火（我在开玩笑）。美国人完全可以理解讽刺，他们只是对在彼此之间使用讽刺觉得不太舒服，因为他们担心这会带来不良影响，就像我们担心枪支会带来不良影响一样。

然而，对幽默有不同看法并不代表在对生活的态度上也有很大分歧。美国人的情感更外露，他们不觉得这有什么好尴尬的。他们的掌声更热烈，欢呼更响亮，强调事物时也更坚定不移。这种坦率常让我略感愧疚心怀歉意，因为英国脱口秀观众对美国嘉宾的笑话和故事只是嗤笑从不哄堂，为他们的成就折服却不发一言，更遑论掌声和欢呼。我们并不是不喜欢他们，我们只是不愿违心地表现罢了。同样，英国人为了在美国的脱口秀上赢得久久不息的喝彩，恐怕很难不把自己弄得面红脖子粗。

当然，我们各自娱乐产业的主流产品更易塑造我们对彼此的总体影响。如果你问一个普通美国人怎么看英国喜剧，得到的回答多半会说到本尼·希尔和《杂

货店奇遇记》（不过，感谢 BBC 美国，这种情况目前已经开始改变了）。很明显，一部剧在另一个国家的观众构成比在本国更加多样化。这可能和剧的某种地域特色有关，与剧本身的好坏无关（当然每部剧都有自己的优点），也许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僵尸肖恩》会在美国大获好评。我们放弃了折中——很多英国电影都试图用这种方式吸引美国人却惨遭失败——这意味着我们的电影是原汁原味的英国演绎。这带来了一定的风险，因为在翻译过程中一些社会文化信息可能会丢失，但仅仅是一些。在《僵尸肖恩》中，唯一没让美国观众开怀大笑的包袱是艾德在周日早上八点要吃可爱多。总而言之，面对吃人的僵尸角色们却淡定从容面不改色，这又给美国观众增添了一重笑料。

在美国人的主流文化产品里，他们的率真常常被多愁善感所取代，而这和我们英国人更为警惕提防，愤世嫉俗的观点不符。这解释了为什么开篇不错的《欢乐时光》最终被甜腻的家庭价值观说教毁了。亨利·温克勒扮演的方兹原本桀骜不驯，却屈从于玛丽昂·罗斯扮演的坎宁安夫人，被美国中产阶级家庭观无情地教化了，而且不再抗议（有趣的是，在剧集的废弃镜头里，温克勒和罗斯却上演了很多表现两个角色之间不可抗拒的性张力的镜头，这些偷偷摸摸的抚摸和吻只是为了带给直播间的观众更多乐趣，然而这种无心插柳却比剧集本身想表达的主题更有趣）。总的来说，要英国人多愁善感，不容易。这会让我们觉得紧张不舒服。一旦遇到那些卖弄情感的镜头，我们会怒不可遏，认为它们一名不值。

然而，随着地球村的壮大，我们的情感习惯也在变化。为了获取些许解脱，我们正逐渐抛却英国式的对情感的压抑——庆幸的是我们还没有完全舍弃它。毕竟，“保守”是我们魅力的重要因素。《老友记》常常被讽刺为一部“俗气”、“矫情”（此言不虚）的情景喜剧，但却受到了英国大众的衷心喜爱。此剧是如此受欢迎，以至于它完结两年后，你会觉得没有《老友记》看日子就白过了一样。这种情况太普遍了。

《老友记》开播时我对它厌恶得很。标题就很倒人胃口，使我的脑海中浮现出那些讨厌又傻气的新一代美国年轻人和他们令人尴尬、毫不掩饰的欲望。一想到所有这些元素合在一起，再加上拙劣的讽刺手法，我就直起鸡皮疙瘩。但它还是把我给迷住了。凭借着优秀的选角和一些真正有趣的台词（“You’ re over me? When were you under me?”），即便是对刻板的英国人而言，《老友记》也很容易

被接受。实际上，这部剧甚至让我们有所改变（其利弊且先不提），起先我对罗斯和瑞秋冷嘲热讽，但看到他们最终和好，深情拥吻的一幕时，我流下了眼泪。这一刻，我实际上找到了在英式幽默和美式幽默间架起桥梁的关键——发自内心的情感表达。英国人对此不反感，我们只是相信这种表达要付出很高的代价。这一幕情感高潮的成功完全归功于之前的喜剧情节，罗斯的烫发，莫妮卡不合身的套装，瑞秋的鼻子都在为这一幕铺垫，所以观众才能真心接受。感情是一种奖赏，而不是一种手段，只求引来一阵饱含怜悯的笑声或者更糟的一声，“哦。”

这种方法在大西洋两岸最优秀的情景喜剧里都奏效了。唯一的区别也许是美国人一般接受地更快。但是，看到代尔在酒馆摔的那一跤（足以与巴斯特·基顿的表演抗衡），谁不会在他拍着爷爷的椅子时流泪？《风流医生俏护士》最后一集中鹰眼的崩溃，萨姆最后一次关上欢乐酒店的灯也引发了类似的共鸣，这都表明我们已经能接受喜剧里的情感元素了。所以，也许我们对美国喜剧没那么不屑一顾。

一部堪称史上最伟大的美国喜剧是诠释这种“值得表露的情感”的极佳范例。《辛普森一家》是一部杰出的剧集，它既有一针见血、令人愉悦的沉默，又是一部无穷无尽的关于一个美国家庭及其所处郊区环境的论著；虽然主要受众是孩子，但这部剧通过坚持对美国社会进行批判和反思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它用明快的色彩和荒唐的场景掩藏起自身的颠覆性，对美国的方方面面都做了讽刺的评论，那些有时看上去不那么美国却不失积极意义的想法在剧中得到了预演的机会。与此同时，这部剧也渗出了浓浓的温情，全剧的主旨非常积极地展现了美国梦的关键：家庭。小布什曾经提出，美国人应该学学沃尔顿家族而不是做辛普森一家。《辛普森一家》的创造者马特·格罗宁对此的回应是：“嘿，辛普森一家和沃尔顿一家可没什么不同。两家人都在祈祷经济萧条快点结束。”

即便你对美国喜剧浅尝辄止，也会发现很多这样的佳作。《发展受阻》、《居家男人》、《人生如戏》、《幕前幕后》等剧集都展示了一种复杂的讽刺艺术。但是打破神话的不仅仅是喜剧更具颠覆性的目标，举例来说，像《周六夜现场》、《辛普森一家》、《飞出个未来》、《宋飞正传》、《风流医生俏护士》（尽管此剧中预先录好的笑声是败笔）、《罗斯安妮》、《欢乐一家亲》、《愚人善事》，都给美国大众

意识带来了冲击。《办公室》就是展示前卫喜剧如何在两个国家造成影响的最好例子。该剧的英国版和美国版有着各自的文化和情感特点，但它们都是叫人隐隐作痛的讽刺诗，刻画了成千上万的英国人或是美国人最熟悉的生活方式。

现在，既然我们已经讨论了“美国人不讽刺”的正确与否，并且决定把这个观点扔进装着消极的（或者偏激的）国际偏见的垃圾箱（我们的 dustbin，美国人的 garbage pail），我们就来看看埃德加·赖特的新作，《热血警探》。我们希望这部电影能在两国之间微妙的差别上乘风破浪，直至这浪花在两国的海岸上冲撞泛红、翻卷着泡沫为止。《热血警探》的情况有点儿类似让托尼·斯科特执导《心跳》，这部剧厚颜无耻地借鉴美国影片的传统，又将这一切打碎了放进一块保守的英国飞地——一处乡村，从来就没想过要使每个人都能看懂。总而言之，我们和美国人不一样，但我们能理解同一个笑话。在这个被偏见和差异所困扰的世界中认识到这点，真是讽刺极了。

（编译：吴雪阁）

来源：<http://www.guardian.co.uk/film/2007/feb/10/comedy.television>

日益严厉的英国反污染性交通政策

据悉，二氧化氮会导致心脏疾病及呼吸系统方面的问题。一些城区将可能开辟“低排放区”来控制有毒气体二氧化氮（NO₂）的排放。这些城市和地区包括纽卡斯尔、利物浦、泰因赛德、谢菲尔德、布里斯托尔、布赖顿、伯肯里德、普雷斯顿、斯温西、贝尔法斯特、英格兰西南部、苏格兰东北部和南威尔士。

包括诺丁汉、莱斯特和朴茨茅斯等在内的九个其他城市已经被准许三年内解决 NO₂ 污染的问题。欧共体稍后将会讨论决定 17 个包括伦敦在内的其他城镇地区这样的特权。2010 年，英国 43 个区域中的 40 个超过了规定 NO₂ 排放的上限。

空气污染方面的环保人士以及环境法相关组织“地球客户”（ClientEarth）和“伦敦清洁空气”（Clean Air in London）十分支持欧共体回绝英国政府试图延缓实施环保措施的举动。他们认为英国这样做是在挑战欧洲法院，并拿数百万欧元罚款冒险。

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已经被给予了很多年来达到欧共体关于空气污染的标准，但却一直没有控制住交通排放的问题，并一直在向欧共体拖延时间。“英国一直以来在减少 NO₂ 排放方面的不作为是十分可耻的。空气污染是对公共健康威胁第二大的问题，仅次于吸烟。它会诱发儿童哮喘以及促使年纪超过 65 岁人群患心脑血管疾病。在我国最繁华的几条街道上，国际卫生组织（WHO）的对空气质量的要求和法律限制被若干因素完全打破了，”伦敦清洁空气（London Clean Air）组织的西蒙·贝克特说道。

由 NO₂ 和煤烟部分燃烧后遗留下的小颗粒引发的空气污染被政府和医学专家认为是继吸烟之后对公共健康的第二大威胁。这一污染每年都要耗费国家约 200 亿英镑。马修·本查，最近被伦敦市长新聘来的环境顾问马修·本查透露说，伦敦年均 PM_{10s} 和 PM_{2.5s} 的含量都不超标。然而，对首都空气污染有最严重危害的实际上是 NO₂。

政府于 2011 年 9 月提交给欧共体的报告中估计伦敦有 698,543 人处在超标 NO₂ 空气环境中。

“英国低下的空气质量是国家的耻辱，每年都会造成数以千万的未成年人口死亡。政府必须严肃对待并采取严明的措施来减少空气污染——或者就只能去面对数百万英镑的罚款了，”地球之友（Friends of the Earth）的环保倡议人士詹尼·贝茨说。

前段时间中国的空气质量问题遭到美国诟病：美国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的使领馆目前自行发布空气污染监测数据。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在美国国务院 6 月 5 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马克·托纳回应说，美方不认为其使领馆的空气监测报告违反中国法律或《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大使馆也将继续发布监测数据。有评论称，这个问题广受关注的原因是由于我国政府把此行为上升到了主权问题的高度。但笔者认为，这只是美国在给中国政府和环保部门施加压力，制造舆论。归根结底，真正值得引起重视的还是中国的环境问题。目前，在中国的大中型城市，空气质量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居民生活质量甚至影响正常工作秩序的重大因素。

但在如何对待和解决中国空气质量这一问题上，国内却众说纷纭。日前，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博士生导师阚海东教授表示，中国的 PM_{2.5} 标准应符合中国

国情。毕竟，中国作为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仍处在告诉发展过程中，对环境高标准的追求势必降低中国的发展速度。但也有环保人士声称，“符合国情”只是幌子，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剥夺民众的知情权。

笔者认为，环境问题虽然在某些程度上制约发展，且不会在短期内产生很大的影响和改变，但从长远和宏观角度来看，中央政府必须再次提高对环境问题的重视。正如《卫报》报道中所说，二氧化氮、可吸入颗粒物都会对居民健康产生巨大威胁：二氧化氮等氮氧化物极易引发呼吸器官慢性中毒，可吸入颗粒物引发的肺心病死亡率极高。可以说，对空气质量问题的不重视、不作为就是置老百姓的生命安全于不顾。更何况，每年花费在治疗这些由空气质量引发的疾病上的投资数额巨大，如果能够从根本上一步步减缓或解决空气质量问题，也能减免这部分费用。

《卫报》报道中英国划区域规划治理的方式以及划分“低排放区”的做法，对于国内一些大型城市的环保治理问题或许有一定借鉴意义。我们不得不承认，在环境保护方面，我国的确没有许多发达国家做得好。笔者认为，这种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并非是发展程度的问题，而是一个思路和处理方式的问题。对于政府来说，环境问题没有“高标准”和“低标准”之分，一味强调“国情”容易给民众带来一种逃避问题的不信赖感。希望政府今后能够正视问题，加大解决力度，出台切实可行的、符合中国情况的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使环保不再仅仅成为一句口号。

(编译：洪露茜)

深度报道

卡梅伦施压谷歌屏蔽色情信息

媒体对儿童凶杀事件的广泛报道尽管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还是引起了人们关于审查制度的辩论。早在1993年，时任首相约翰·梅杰就认为“充斥荧屏的暴力”是诱发凶杀案的因素，这让人不禁想到两岁男童杰米·布杰被杀害的案件。7月22日，卡梅伦接待了一位孩子惨遭恋童癖杀害的母亲。他宣称，从一位父

亲的角度出发，他将对网络色情施加新的限制，其中包括合法内容（涉及成人色情）和非法内容（涉及儿童色情）两类。

卡梅伦首相的计划并无特别重大的意义。在今后，英国每个接入互联网的家庭都将面临是否安装过滤器的选择，这种过滤器会把色情网站从家庭网络屏蔽。尽管过滤器同样存在屏蔽掉大量无害网站，或使某些色情网站漏网的可能性，但它能帮助家长预防青少年因浏览色情内容引发的犯罪。早在卡梅伦要求他们有所作为之前，网络服务供应商就已经采用了这种“积极的方案”，但这一次卡梅伦敦促他们的执行务必更有力度。

卡梅伦继续对谷歌等搜索引擎施压，他认为正是这些搜索引擎鼓励了恋童癖。他声称有些检索词根本就不应该有搜索结果。如果公司不合作，他将诉诸法律。他希望将含有模拟强奸的色情作品的网上内容判为非法，誓言创造一个“商店没有，网上亦无”的洁净世界。

这种做法是愚蠢的。工党政府之前针对“极端色情电影”实施的禁令并未取得良好效果：“老虎色情”案被判为无罪释放，这多少有些令人尴尬。而针对模拟强奸的禁令仍然不会产生太大效果。迈尔斯·杰克曼是位专门研究淫秽犯罪的律师，他说很多会引起异议的内容在海外是合法的，它们太难以清除了。有人认为搜索“虐待儿童”关键字就能轻易浏览到非法图片，这一观念是错误的：和其他搜索引擎一样，谷歌早就与警察机构和互联网监察基金会（一个谷歌赞助的慈善团体）合作，以监督关于非法内容的索引。卡梅伦自己也承认，多数色情作品是通过私人邮件、点对点技术和其他隐蔽的方式传播的。

卡梅伦首相的一些采访和演讲受到了小报的密切关注。这一举动似乎在取悦著名报纸《每日邮报》。近几个月，《每日邮报》和一些保守党议员一同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活动，旨在反对儿童色情和谷歌。卡梅伦曾遇到过此类问题——恰恰相反的是，彼时他谴责了服装零售商针对儿童采取的色情化商业模式。

这次反色情的矛头指向互联网科技公司是政治上的新动向。卡梅伦先生曾造访谷歌公司的办公地，并对其不吝赞赏。他曾多次访问了位于伦敦东部角落的肖尔迪奇区，这里云集了众多处于创业阶段的互联网公司。2010年，在这些企业的要求下，卡梅伦通过了一项旨在推动英国企业发展的著作权法。然而，在此之后，卡梅伦的科技顾问们纷纷加入了报纸的阵营，批判谷歌公司有意避税与传播

色情内容等不良行为。遗憾的是，如今的卡梅伦自己也站在了报纸这一边。

（编译：赵晴）

卡梅伦：政治家还是父亲？

赵 晴

在 YouTube 刚刚火起来的那年，我也翻墙去凑了热闹，在国内势必会被屏蔽掉的东西竟然那么安然地躺在主页上，第一次意识到了网络自由竟然离自己这么远。后来也懒得翻墙了，安于接受被过滤掉的信息，做了一个安分守己的好网民。但这时在英国，卡梅伦首相却要开始在网络上扫黄打非了，这让我们这些出生在网络防空洞中的网民感慨良多。

Rebuilding family, rebuilding community, above all, rebuilding responsibility in our country 这是卡梅伦在 2010 年 5 月 11 日就职首相的演说词中我最喜欢的一句。“重建”向来是需要义无反顾的勇气，更何况英国面临着积重难返的社会问题。

对内，英国政府并没有很好地把握网络自由和网络监管的关系，网络暴力及其延伸到现实中的骚乱屡屡发生。2011 年，英国发生了非常恶劣的网络暴力骚乱，卡梅伦接受采访时说：“信息的自由流动可以用于行善，但也能被用于作恶。”；对外，英国鼓吹的“绝对网络自由”却被用作政治利器，对他国网络管理大肆攻击，这让人不难想到三十六计中的“无中生有”。

但仅仅时隔一年后，英国人又一次尝到了网络自由带来的苦果：在 2012 年的 2 月与 8 月，英国 12 岁的女孩蒂亚和 5 岁的女孩琼斯，正值芳华妙龄伊始，却遭遇性侵害，两起幼女被色情虐杀事件在社会引起轩然大波，而蒂亚案的作案者斯图尔特和琼斯案作案者竟然都经常浏览儿童性侵内容网站。蒂亚的父亲抚摸着女儿的照片相框，恳请首相遏制互联网色情。随后，卡梅伦向谷歌、雅虎及其他互联网公司发出通知，要求他们在今年 10 月前，务必提供屏蔽网络儿童色情内容搜索的方案，否则英国政府将诉诸法律。

《卫报》对此采取了冷嘲热讽的态度，认为这是保守党在支持率节节败退的情况下抛出的政治伎俩。大家对于这项政策的实际效果都心里有数，网络如洪水猛兽，可疏不可堵。一项政策若没有很大的实际效果，难免让人认为是政治游戏

中的又一步棋：2012年后，由于糟糕的经济形势，卡梅伦的支持率不断下降，并在2013年降到新低。这两年来，卡梅伦从根深蒂固的保守派进化成实用主义政治家，他的很多政策实际上试图左右逢源，撼动那些二战后定义英国的关键政策：全民医疗服务计划、社会福利、教育普及以及养老金体系。但是，这次对网络色情传播宣战，结局又将如何呢？

2015年大选在即，卡梅伦为连任布局情有可原。但虽然有做秀的嫌疑，屏蔽网络色情并不是一只回报率高的股票。一方面，这只是公共政策中的一小部分，屏蔽网络色情虽然会博得英国家长们的好感，但相对于修改直接关乎民生的社会福利政策，这并不能算是扳回支持率的高招。他甚至会因为收效甚微遭到各方攻击，将自己的失败暴露在全英国每户家庭餐桌的报纸上，而这确实也不幸发生了；另一方面，面对两年后的大选，退出欧盟的公投才是重头戏。近几年来，欧洲已经完成了政治向右转的拼图，保守派纷纷接过政权，但欧洲的经济状况愈来愈差，这导致政治一体化举步维艰。在英国，只有37%的国民支持继续留在欧盟，但卡梅伦认为“这种态度会阻止世界前进，如果英国不属于欧洲，那么英国就不再伟大。”暂且不论从政治经济利益的大局考虑，这句话足以体现出一个首相的气度——英王威廉四世的直系后裔都可以接受留在欧盟，他骄傲的国民却无法忍受。卡梅伦的坚持有可能让他关掉首相的职位，对他来说，不附和脱欧派的政治风险不仅存在，而且还很高。

在卡梅伦的一个演讲中，他说“有人说，政治是丑陋的舞台，如此看来，我真的已经站在这个舞台上了。最近有科学家提出要用政治家替代老鼠做实验，为何？因为政治家遍地都是，没人不在乎他们怎么了。另外，有的事情老鼠做不出来，政治家却能办到。”在听众的哄堂大笑后，他引出了这次演讲的主题，Return power to people，在他看来，只有这样才算得上后政府时代，才能构建新福利社会。但是，倘若人民坚持要更多的自由又该怎么办呢？

因此，相对于将这件事作为提高支持率的筹码的政客，我更想相信卡梅伦是出于一个父亲的角度为这件事亡羊补牢。

卡梅伦自己是一位育有三个子女的父亲，在2009年，长子伊万·卡梅伦不幸夭折，年仅6岁，这件事给卡梅伦夫妇带来了极大打击，卡梅伦一度考虑退出政坛。我想，如果儿子还活着，卡梅伦会希望孩子可以在健康的环境下成长，而

不是在一个自由到滋生色情犯罪的环境中迷失。

失去自己的孩子之后，对卡梅伦来说，“父亲”这两个字的担子可能更重了些，因为全英国一千多万名青少年的未来就掌握在他的手上。如果任凭色情内容随意泛滥，网络就极有可能成为培养色情狂与杀人犯的温床。毫无疑问，网络科技的发展必定会培养出那些日后能够带领英国走出困顿的领袖。问题在于，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正确的使用它。

如何继承撒切尔夫人的遗产

（英国研究中心 顾诗婷）



2013 年 4 月 17 日，国际政要云集伦敦圣保罗大教堂 (St Paul's Cathedral)，参加玛格丽特·撒切尔 (Margaret Thatcher)，英国历史上首位女首相的葬礼。4 月 8 日其因中风去世，终年 87 岁。据悉这是近半个世纪前温斯顿·邱吉尔 (Winston Churchill) 去世以来，英国为一位前首相举办的最隆重葬礼。撒切尔得到完整的军事礼仪待遇。她的灵柩被放到六匹黑马拖拽的炮车上，运往圣保罗大教堂，大笨钟 (Big Ben) 暂停报时。同时，撒切尔夫人去世的消息传出之后，示威活动的威胁也不绝于耳，故伦敦警察厅 (Metropolitan Police) 投入 4000 多警员的警力保障葬礼顺利进行。

参加葬礼的有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应邀出席的共有包括世界各地 11 名现任总理（首相）在内的 2300 名嘉宾。葬礼结束后，一场小型的仪式将在伦敦西南部的莫特莱克举行，在这场只有亲人参加的仪式上，撒切尔夫人的遗体会被

火化。据悉，她的骨灰将会安葬在切尔西皇家医院的墓地，与她 2003 年去世的丈夫丹尼斯相伴。

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在英国广播公司广播四台(BBC Radio 4)

《Today》节目中表示：“从某种意义上说，如今我们都是撒切尔主义者。”这位现任英国首相说得没错，作为 150 年来执政期最长的英国首相，撒切尔为英国的政党政治及民族国家抹上了一层厚重的“撒切尔主义”色彩。然而该如何看待她为她的国家所留下的经济、政治遗产？英国人民又该如何加以传承并从中获益？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讨论。

“铁娘子”剪影

1979 年 5 月 4 日，英国历史上保守党第一位女党魁，也是英国第一位女首相，意气风发地踏上了[唐宁街 10 号](#)的台阶，面对着看台上的芸芸众生，说出了一段振奋人心的话：“混乱处我们带来和谐，错误处我们带来真实，怀疑处我们带来信任，沮丧处我们带来希望。(Where there is discord, may we bring harmony. Where there is error, may we bring truth. Where there is doubt, may we bring faith. And where there is despair, may we bring hope)”她就是让英国人民爱恨交织，让男政治家敬而远之，身体力行鞭策全世界女性为男人所不能为的玛格丽特·希尔达·撒切尔。讽刺的是 2004 年 5 月在英国人纪念撒切尔上台 25 周年之时，英国《卫报》在回忆那历史性的一刻中用嘲讽的语气写道：“即使是她最坚定的支持者恐怕也很难举出一个例子，可以证实她执政 11 年中给我们带来的‘和谐’。”

回顾撒切尔夫人的一生，她的政治早期颇为坎坷，两次参选议员失利，入阁之后，出任教育大臣，却徘徊在辞职走人的边缘。凭借机遇与斗志，在英国 80 年代初期的经济衰退中，凭借福克兰岛之战的胜利，挺过了第一届糟糕的任期。在第二届首相任期中，她对北部英格兰地区，痛下杀手。1984 年，她对煤矿工业的镇压力度，大力推行私有化政策，有人戏称说这相当于完成了一场小规模“中国国企改革”。

在国内经济企稳同时，她走向更大的国际舞台，以女性的身份，告诉男人怎么样搞政治，她让政治暴力变成有韧性的博弈，砸开了柏林墙，摧毁了铁幕，搅动欧洲一体化的不确定性。她毫不犹豫地支持亲英的南美独裁政权，批评曼德拉是恐怖分子。不过，就像英国伯恩茅斯大学心理系讲师曾飏所扼腕的那样，“今天英国的男性政客们，享受她的改革带来的经济制度遗产和政治蓝图之余，极少有政治家敢于继承她的政治勇气，今天的国际舞台，也完全失去了 80 年代的戏剧性，只留下丑闻和沉闷的幕后操作。”

经济遗产

如今的英国经济是玛格丽特·撒切尔 (Margaret Thatcher) 留下的遗产。在她之后的英国政府没有改变她大致的政策路线。约翰·梅杰 (John Major) 实行了铁路私有化。工党 (Labour) 对伦敦金融城 (City of London) 施行了轻度监管，并让英国央行 (Bank of England) 实现了独立。当英国政府逆转路线时——例如提出最低工资标准，这些措施经过了仔细斟酌。那么，我们应如何评判撒切尔夫人的遗产？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LSE) 教授约翰·范雷南 (John Van Reenen) 指出，自 1979 年以来，英国经济至少取得了 4 项显著成功。



1. 结束了长达约一个世纪的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的弱势。根据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 (Conference Board) 的数据，1979 年，英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GDP) (以购买力平价计算) 为美国的 76%，而法国的人均 GDP 为美国的 82%。到 2007 年，英国人均 GDP 升到了美国的 83%，法国则降至 73%。到 2007 年，英国人均 GDP 在七国集团 (G7) 中位列第三，仅次于美国和加拿大。

2. 这一明显好转源自于就业和生产率的相对改善。1979 年，英国人均产出为美国的 75%，远远落后于法国（88%）。到 2007 年，英国人均产出为美国的 85%，与法国持平。

3. 生产率的改善不仅仅是一场金融泡沫的结果：1979 年至 2007 年，只有 10% 的生产率增长来自金融业内部。

4. 自 2007 年以来整个经济生产率下滑，只是反映出实际工资灵活性的提高以及随之而来的就业的强韧性。另外，自 2007 年以来的疲弱生产率表现没有侵蚀之前所有的增长。

因此这证明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监管改革——放开劳动力市场、取消补贴、推行私有化——确实改善了英国经济的表现。但范雷南教授还指出了重要的不足：不平等程度上升、金融监管过于放松以及人力和实物资本投资不足。

撒切尔夫人对英国经济有着 19 世纪的观点，对 20 世纪的多数观点持否定态度。她是一位务实的政治家：她没有寻求取消福利制度。但她的核心理念是，所有美好的事情将在让政府变小后出现。

所以，英国应如何对待撒切尔夫人的经济遗产？正如英国央行高官安德鲁·霍尔丹 (Andy Haldane) 所指出的那样，政府在某些领域推行彻底的简单化（例如税收和金融监管改革）可能会让经济运转得更好。然而，在其他方面，英国政府必须更为积极地采取行动。例如，它需要考虑其资产负债表，而不仅仅是债务。它必须在利率如此低的情况下，认识到为什么应大幅提高投资。它必须更了解其在推动以科学为主导的创新方面所应发挥的作用。

外交遗产

评价玛格丽特·撒切尔 (Margaret Thatcher) 的政治遗产时，多数评论者谈论的主要是她在英国国内私有化、降低收入税和削弱工会影响力等作为。不过，这似乎就忽略了这位前首相的外交遗产。撒切尔外交遗产的影响范围和复杂度都超出了许多人的认识。

首先，撒切尔奉行的是“弱国无外交”的理念。这种理念意味着，英国经济必须重返正轨。要影响世界，一方面需要足够的资源，另一方面还要竖立一种典范，令别国不得不尊重。这是一条真知灼见，值得当今的美国认真思考。



其次，撒切尔夫人几乎毫不姑息侵略行为。她的外交政策原则性很强，这种外交政策令她拒绝在福克兰群岛(Falklands)向阿根廷的武力挑衅屈服，十年之后对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入侵科威特也同样如此。对她来说，原则才是生死攸关的问题，比任何根本利益都重要得多。容忍侵略会形成一个先例，迟早会损害核心利益。

提到撒切尔的外交，就不得不提及她和美国的渊源。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认为与美国结盟对撒切尔来说则是一种信念。即便这种信念不能每次都得到回报，那也无所谓。美国不愿意全力支持英国跟阿根廷打仗一事，只是令她有些失望，而不会令她与美国翻脸。而里根政府未与英国商议就派遣军事力量进入格林纳达这一令人尴尬的事实，也同样如此。这种必须与美国政府保持密切关系的理念，是基于对强权的欣赏。撒切尔夫人是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不然的话，如何解释她尽管憎恶爱尔兰共和军(IRA)的恐怖主义行径（她曾两次侥幸躲过爱尔兰共和军的暗杀），却支持让爱尔兰共和国政府发挥更大作用，支持给予北爱尔兰的天主教徒更公平的待遇？

不过这些并不意味着撒切尔夫人没有认识盲点——她当然有。比如说，虽然联合国(UN)或欧盟(EU)等国际组织能够赋予一国的外交政策以合法性、从而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或能够帮助一国拓展市场、以及稳定局势，但是撒切尔夫人往往强调这些组织的弊端，而较少提及其优点。另外，她可能受成见的影响太深，这在相当程度上解释了她为何反对东西德统一，尽管统一后的德国留在了北约(Nato)内。

不过有盲点并不等于盲目（后者更为普遍）。相反，玛格丽特·撒切尔知道，奉行实用主义是必要的，坚持原则同样是；保持灵活性是必要的，坚持自己的立

场同样是。她顺应时势地与苏联(the Soviet Union)对峙，却又敢为天下先地拥抱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作为一个往往腾不出多少时间给外交部的领导人，撒切尔在外交方面交出了一份相当不错的成绩单。



撒切尔是一个有政治信仰，政治理念和政治追求，有着鲜明个性特点，敢于明确表达自己观点，敢于承担政治风险的政治人物。这在1980年以后的国际政治舞台上，并不是非常多见的。撒切尔走了，走完了她辉煌的政治人生。她给这个今天的英国和世界留下了几笔浓墨重彩，以致于后来的继任者，无论是来自于保守党还是来自于工党，都无法摆脱撒切尔主义的影子，兴许正如一些评论家所说的，英国已经进入了没有撒切尔的撒切尔主义时代。撒切尔主义，右派和资产阶级视之为经济圣经，而劳动阶级和大多学者视

之为毒药。撒切尔主义，作为英国社会和西方经济学理论界的遗产，无论是其中的经验或者教训，千秋功罪，都值得后人去评估，去梳理。

特别申明

本研究简报所有内容版权归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所有,任何报刊、媒体、
学术机构如需引用请与本中心联系。

电话: 021-67702080; 15921160155;

邮箱: Britishstudies@vip.126.com